

## 唐宋“水力磨坊案”发覆

——兼谈中国古代“重本抑末”论的表达与实践

方万鹏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水力磨坊案”是指水力磨坊因在用水的问题上与农田灌溉、水运之间产生矛盾而被拆毁的水案,在唐宋京畿是一个颇为突出的现象。水力磨坊的经营者多为官方或权势之家,水案的发生亦往往有帝王的诏令或躬身参与,是故相应的历史记载多见于正史君臣传记、政书或类书当中。“水力磨坊案”的历史书写突出表现在对“圣君良吏”人物形象的建构,而其作为事件的叙事完整性却存在缺陷。这一书写特点既彰显了唐宋王朝所秉承的“农本”政治文化,亦揭示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即实际运作层面之间的复杂面相,从而使得水案本身具备了丰富的政治表达意蕴。在传统政论语境下,农田灌溉与水力磨坊分别是“农本”与“末技”的代表,“水力磨坊案”的历史书写与史实面相的差异实则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技”观念表达与实践的不同历史侧面,不能据此简单得出“重本抑末”的结论。

**【关键词】**水力磨坊案;历史书写;政治表达;“重本抑末”论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6-0099-09

## Reinterpretation of "Watermill case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n the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tressing the (agriculture) Basis and Restraining the Superficial" Theory

FANG Wan-pe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A "Watermill case" referred to the water case caused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atermill and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which was a quite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the capital cit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its environs. The operators of watermills were mostly officials or powerful families, and the occurrence of water cases often involved imperial edicts or personal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he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mostly found in biographies, political documents, or reference books of official history.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watermill case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age emperor and good officials" image, however which had defects as narrative integrity. This writing style not only showed the "agriculture-based" political culture inherited by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ut also revealed the complex expres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actions. Therefore, the water cases had the affluent implication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ontext, farmland irrigation and watermill represented "the agriculture basis" and the "technology". As a resul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historical facts of "watermill cases" reflected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at, we

**【收稿日期】** 2021-0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技术社会史视野下中国传统水力机械研究”(21FZSB064)

**【作者简介】** 方万鹏(1986- ), 历史学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环境史、技术史。

could not draw a simple conclusion to the "stressing the basis and restraining the superficial" theory.

**Key words:** watermill cases; historical writing; political expression; the "stressing the basis and restraining the superficial" theory

## 引言

水磨是人类利用自然力和制造大型机械能力结合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代表了较高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魏晋以降,一场饮食革命在中国北方地区渐次展开:一是小麦的消费方式逐渐由粒食向粉食转变,粟麦并重的种植、利用格局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二是自中唐以后饮茶之风的盛行,饼茶、末茶构成了其时成品茶叶的主要形态。饮食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这场饮食革命始于中古伊始,凸显于中唐前后,直至北宋时期仍在持续推进。水磨<sup>①</sup>作为以水为动力、以制粉为主要功能的水力机械,在这场革命中迎来了发展的历史契机<sup>②</sup>。其或为权势之家、富商大贾所有,或为官方规模化组织利用,由此在用水的问题上引发了与农田灌溉、水运等常规水利活动的诸多矛盾,水力磨坊也出现了多次被拆毁的现象。在水利社会史的学术语境下,用水矛盾所引发的区域社会纠纷通常被称为“水案”,是故权且将水力磨坊引发的用水纠纷问题称之为“水力磨坊案”。

然而,与明清以来一般意义上“水案”的地方性色彩不同,唐宋“水力磨坊案”多发生在京畿,且往往有上至帝王、下至朝廷官员等重要政治力量的参与,因此在史籍的记载中颇为突出,故而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探讨。目力所及,围绕唐宋“水力磨坊案”的相关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彼时,日本和中国一批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先后都关注了这一问题,并在“水力磨坊案”的问题上形成了若干基本而重要的学术积累,而其核心论题之一则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官方的水力磨坊政策?概言之,所谓“水力磨坊案”,从表面来看是水力磨坊与灌溉水利秩序的关系,但实质上,在传统政论语境下,水磨是代表了追逐私利的先进技术,而灌溉则是农本的象征。因此,探讨“水力磨坊案”所呈现的官方政策,实则藉此个案可呈现传统社会精英阶层有关“农”“技”观念的认知与实践,其代表性观点集中体现在西嶋定生、钱穆和吴晗的相关研究中。三位学者的论断皆是以“水力磨坊案”为基础,进而推出“重农抑技”的论断,如西嶋定生认为,“从政府坚持农本主义的根本政策立场上来看,经营碾硪不单纯是追求末利,而且还同政府保护水利灌溉的政策背道而驰,这是决难允许的。”<sup>③</sup>钱穆指出,“宋代仍亦有官磨,而似已远不如唐代之盛矣。当见某书谓欧洲工业时代负有显著作用之机械水车,在中国则为保护农业之名义而压抑,实为中国工业停滞不发达之一因。……中国历代相传压抑权门悯恤小民之政治观念与法律思想,实皆足以摧抑资本主义之进展矣。唐人盛行炼丹,其后乃并不能发展而成如西方之化学,亦一例也。”<sup>④</sup>吴晗亦认为政府在以政治力量压迫贵族官僚屈服,但在撤毁碾硪的同时也在破坏前进的技术<sup>⑤</sup>。

要之,20世纪前半期中日学者围绕唐宋水力磨坊政策问题的研究,不论是材料发掘、解析,还是问题意识阐发,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0世纪中后期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较多地关注并追

① 水磨即水硪,或与水碾并称碾硪,是唐人的习惯称谓。水磨称谓至北宋在史籍记载中方才逐渐占据主流。以下论述及引文皆遵从引文文本的称谓习惯,特此说明。

② 方万鹏:《自然物种、消费风尚与技术工具的成长动力——6—12世纪中国水力磨坊扩张动因探论》,《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③ 参[日]西嶋定生:《碾硪寻踪——华北农业两年三作制的产生》,韩昇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2年。需要注意的是,西嶋定生认为以大历十三年(778)的拆毁碾硪事件为分界线,唐前期官方推行禁设碾硪的政策,唐后期官方则出于自身经营的需要转而进行保护。

④ 钱穆:《水碓与水硪——思亲疆学室读书记之十四》,《责善半月刊》1942年第21期。

⑤ 吴晗:《中古时代的水力利用——碾、硪、碓》,《中国建设月刊》1948年第1期。

随西嶋定生的论断<sup>①</sup>,问题意识缺乏新的突破。而综观前人的问题观照和研究进路,除了基于史料发掘史实外,对于文本本身的分析亦应是一个重要路径。因为相关记载多见于正史君臣传记、政书或类书当中,从历史书写者的角度和立场观察,其着力点似乎并不在于记录“水力磨坊案”本身来龙去脉的完整性,而是有着潜在的建构圣君、良吏历史形象并传达特定政治文化的意图。因此,如果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将历次“水力磨坊案”视为可资立论的完整事件,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或将受到质疑,例如拆毁水力磨坊行动能否代表官方政策?尤其是能否由此推导出重农抑技的结论?本研究将致力于通过文本祛魅,进而试图就水力磨坊政策以及中国古代“重本抑末”论的表达与实践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敬祈方家指正。

## 一、“水力磨坊案”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表达

唐宋时期,著于史籍的典型“水力磨坊案”计有八次,唐和北宋各四次。其中唐代四次分别发生于高宗永徽六年(625)、玄宗开元九年(721)、代宗广德二年(764)和大历十三年(778),地点均在京畿郑、白诸渠。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硐,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许顷,请修营此渠,以便百姓。至于咸卤,亦堪为水田。’高宗曰:‘疏导渠流,使通溉灌,济拔炎旱,应大利益。’太尉无忌对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比为碾硐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于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硐,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sup>②</sup>开元九年正月,“京兆少尹李元纁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缘渠立硐,以害水功,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广德二年三月,“工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硐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大历十三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废拆总四十四所。自今以后,如更置,即宜录奏。’其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余所。先是,黎干奏以郑、白支渠硐碾,阻隔水利,人不得灌溉,请皆毁废,从之。时昇平公主,上之爱女,有硐两轮,乞留。上曰:‘吾为苍生,尔识吾意,可为众率先。’遂即日毁之。”<sup>③</sup>

北宋四次分别发生于太宗至道二年(996)、真宗景德二年(1005)、仁宗庆历四年(1044)和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道二年五月,知怀州许衮奏称,“蒙差奉职张致与臣相度开畎河水,浇溉人户田苗,并官竹园。臣等相度,所有令狐管水磨两盘,寔是每年配率民户于丹河作堰,功料至大,百姓甚困敝,欲望特行停废。”<sup>④</sup>太宗回应称“川谷通流,浇溉畎亩,乃农田之急务,岂可以水磨微细课入妨百姓之利哉?其水

① 相关研究可参梁中效:《唐代的碾硐业》,《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王利华:《古代华北水力加工兴衰的水环境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郭华:《唐代关中碾硐与农业用水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刘小平:《水碾与中古水权管理制度述论》,《历史教学》2009年第2期;于晓雯:《从碾硐管理看唐宋水权概念》,台师大历史系、中国法制史学会、唐律研读会主编《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论集〉》(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361-385页;郭志安、王娟:《北宋水碾硐业中的官私博弈》,《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第2期;杨晓宜:《从〈为人兴利判〉看唐代官员的均水理念与执政经验》,《早期中国史研究》(台湾)2017年第9卷第2期。以上研究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承认唐代碾硐政策转变的前提,梁中效认为唐王朝不可能毁掉所有碾硐是因为长安众多人口的仰赖,而王利华则将其与水环境变化、官方在水田经营和碾硐经营之间的选择取舍上出现变化给出了新的解释;二是站在法律的立场,强调水资源立法的先进性和实际操作中的践行不足。在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1936年第4卷第7期)等论述的基础上,刘小平、郭华等研究侧重于观察矛盾的历史面相,而于晓雯、杨晓宜等则重于分析矛盾之后的法律细节及其设计原则。此外,朱华《唐代关中地区碾硐毁废原因新探》(《唐史论丛》第32辑)一文从自然因素和立法管理角度反思了唐代关中的碾硐政策。

② [唐]杜佑撰:《通典》卷2《食货二·水利田》,中华书局,1988年,第39页。

③ 第2、3、4条材料皆见[宋]王溥撰:《唐会要》卷89《硐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24-1925页。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水利上》,中华书局,1957年,第4907页。



磨依奏废两盘,见存留者亦与减放一半课额。”<sup>①</sup>景德二年五月,“诏开京城濠以通舟楫,毁官水碓三所。”<sup>②</sup>庆历四年十月,权发遣户部判官公事燕度奏称:“近华州渭南知县曹公望尝引敷水,溉田甚广,民间颇称利便。却闻有人为妨私家水磨,遂讼于官。虽州县不行,然虑陕西水势可以疏引浇溉去处不少,似此尽为豪势之家占为碾碓之利,而州厌见乎讼,不敢尽心计画。欲乞特下陕西都转运司,如州县能以水利浇溉民田广阔者,应是妨滞公私碾碓池沼诸般课利,并须停废,不得争占,州县仍不得受理。”<sup>③</sup>仁宗先是“诏三司详定”,继而又“寻移陕西都转运司就近相其利害”。转运司肯定了燕度的进言,“度擘画委是经久之利”,于是依奏实行。哲宗元祐元年,是年,熙宁新法已被废黜殆尽,元祐党人执掌朝政,侍御史刘摯、右司谏苏辙等人开始力陈元丰水磨茶政之种种弊端,其中罪状之一便是损害农田。刘摯称“磨河之水,下流壅散,浸漭民田,被害者数邑。”<sup>④</sup>在刘摯等人的谏议下,哲宗遂罢水磨。兹将历次“水力磨坊案”相关信息列表如下:

表 1		唐宋“水力磨坊案”所涉信息表			
	时间	地点	事由	人物形象	
				正面	负面
唐	永徽六年	京畿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高宗、长孙祥、长孙无忌	富商大贾
	开元九年正月	京畿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玄宗、李元纁	王公之家
	广德二年三月	京畿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代宗、李栖筠等	王公寺观
	大历十三年正月	京畿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代宗、黎干	诸戚
北	至道二年五月	怀州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太宗	官水磨
宋	景德二年五月	东京	水力磨坊妨害水运	真宗	官水磨
	庆历四年十月	渭南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仁宗、知县	豪势之家
	元祐初	京畿	水力磨坊妨害农田水利	哲宗	官水磨

综观前文记载,“水力磨坊案”相关史料出处以《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册府元龟》等为主。那么,水磨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何以进入文本尤其是正史、政书类文献?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水磨作为史书立传人物群体财富和营利的象征,二是水磨作为特定区域尤其是京畿水利秩序的矛盾焦点迫使帝王参与,这两个因素使其与“帝王将相”群体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颇有趣味的是,在史家的褒贬之笔下,与水磨相关的人物形象在文本记述和历史评价中呈现出正、负两个极端,例如水磨的所有者多为权势之家,而磨坊主的形象多呈负面。以唐代“水力磨坊案”的磨坊主为例,除了昇平之外,其他多以“富商大贾”“王公寺观”等笼统称之,而梳理有唐一代的文献记载便会发现,凡是被明确冠以磨坊主身份的,史书建构出的形象往往都是负面,如李林甫、高力士、仇士良等。<sup>⑤</sup>北宋的水力磨坊案例同样如此,虽然其人物形象不如唐代具体,但记述文本对水力磨坊的兴置者均持否定或批评态度。因此,结合“水力磨坊案”中诸多“记名”或“不记名”的磨坊主形象,水力磨坊似乎成为一个建构权贵罔顾民生疾苦、肆意敛财负面形象的特别素材。与之相对,“水力磨坊案”的历史书写对正面人物形象的建构更加典型:一是心系苍生的圣君形象,如有唐一代的高宗、玄宗、代宗,北宋时期的太宗、真宗、仁宗、哲宗等;二是不畏权势、执法果敢的良吏形象,如长孙祥、李元纁、李栖筠、黎干、许

①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水利上》,第4907页。

②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94《河渠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2343页。

③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水利杂录》,第5920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0“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中华书局,1992年,第8938页。

⑤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载称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碓,利尽上腴”,中华书局,1975年,第3238页。《旧唐书》卷184《宦官·高力士传》记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第4758页)又有“中使仇士良水碓亭子在城东”,参[唐]段成式,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172页。

袞、燕度、刘摯等。圣君与良吏的形象建构相辅相成。从文本受众的角度来看,这种正负形象鲜明的书写模式极大地迎合了人们对圣君良吏重建水利秩序的情感诉求和历史想象,而很少会去追问行动本身的实际效果如何,历史面相的复杂性亦往往因此而被遮蔽。

以高宗年间的“水力磨坊案”为例,此次水案展现给后人最鲜明的一点就是高宗和长孙叔侄圣君、良吏的形象。但是问题的悖论又在于,圣君良吏的存在却无法阻挡水力磨坊侵害近在咫尺的京畿灌溉之利,更无法阻止被拆毁的磨坊很快恢复。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了这次事件,但称“未几,所毁皆复。”<sup>①</sup>再如唐代第三次拆毁行动之后时间不长,李栖筠便为元载所忌,出任常州刺史,而水力磨坊又“私制如初。至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sup>②</sup>《册府元龟》亦称李栖筠“奏京畿诸县百渠下王公寺观碾硃,凡七十余所,有妨农利,并请毁废,计收田租二百万。言入,帝甚善之,为权臣不便,寝之。”<sup>③</sup>可见实效并未维系多久。此外,唐代宗前后两次亲历拆毁活动,北宋哲宗元祐初罢水磨,及至绍圣四年(1097),又在长葛等处“京、索、潞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sup>④</sup>。而于地方官员来讲,宋太宗获悉奏报之前令狐水磨妨害地方多年,燕度所奏“州厌见乎讼,不敢尽心计画”。这些细节表明,如果研究者能够注意到水力磨坊案发生的种种前奏和实际后果,那么如何定位案发地区水利秩序的常态状况将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但是,颇有趣味的是,诸如《通典》《唐会要》所载之事宜,尽管在《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等君臣纪、传和相应门类中亦有记载,但类似“所毁皆复”“私制如初”却均无迹可寻。易言之,“水力磨坊案”的书写或可视为一种选择性叙事,其目的并不在于事件本身的完整性,而是在完成部分史实记载、呈现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建构圣君、良吏形象的素材。而比形象建构更进一步的,则是支配文本书写的政治表达意图。

“水力磨坊案”历史书写的背后蕴藏着特定的政治表达动机,这种政治表达的基本立场便是自战国以降历代中原王朝对“以农立国”传统的秉承和坚持<sup>⑤</sup>,至唐宋时期,已经发展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在其支配下,与之相关的文本表达往往便将“农”定义为生民之本、社稷根基,而“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利”等则处于“末”的位置,正所谓“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sup>⑥</sup>。水力磨坊经营作为以技术为核心的工商业经营行为,在传统政论语境下,“水力磨坊案”恰恰体现了“农”与“技艺”“工商”的本末对立。以唐大历十三年(778)的“水力磨坊案”为例,《旧唐书》所记<sup>⑦</sup>与《唐会要》大体一致,《新唐书》则有所不同,其称:“京兆尹黎干以请,诏撤硃以水与民。时主及暖家皆有硃,乞留。帝曰:‘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唱!’即日毁,由是废者八十所。”<sup>⑧</sup>代宗所言将“诸戚”与“苍生”对立了起来。而《册府元龟》记其事则更加详尽,且补充了不少细节,其称:

大历十三年正月,坏京畿白渠硃八十余所,以妨夺农业也。帝思政理之本务于农人,以田农者生民之源,苦于不足;硃碾者,兴利之业,主于并兼。遂发使行,具其损益之由。僉以为正渠无害,支渠有损。乃命府县凡支渠硃一切罢之。时昇平公主,上之爱女,出降驸马都尉郭暖,有硃两轮,并暖父子仪有硃两轮,并在支渠内。公主闻之,不时入谒,乞留此硃。帝目公主曰:“吾为苍生,尔识吾意?可为众先。”公主遂即日毁之。由是诸硃不令而毁者非一,百姓便之。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一》,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一》,第11页。

③ [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474《台省部·奏议第五》,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367页。

④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4《食货下六》,第4507页。

⑤ 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⑥ 《商君书·农战》,中华书局,2012年,第27页。

⑦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20《郭暖传》,第3470页。

⑧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62-3663页。

自去冬少雪,是日雨雪丰霈,咸以为圣感。<sup>①</sup>

《册府元龟》的记载不仅特意强调了代宗坚持“农本”的立场,将碾硞定性为与之相对的“兴利之业”,而更意味的则是称拆毁行动之后“雨雪丰霈,咸以为圣感”。又《册府元龟》记李栖筠事,称豪家贵戚“置私碾百余所,以收末利”<sup>②</sup>,即明确将碾硞之利界定为“末利”。再有同书记开成元年(836)正月唐文宗与宰臣郑覃、李石的一番君臣对话,先是李石奏“泾阳水利,方春作时,请禁碾硞;秋冬水闲,任却动用。”郑覃亦称“务农乃原其本也,游手末作,自当衰止。”<sup>③</sup>所谓“务农”乃“原本”,营事碾硞乃“游手末作”、牟取“末利”,正是唐人基于“农”“技”关系“本末观”的典型体现和表达。与之相类,北宋太宗、仁宗年间的案例亦有此种表达,如将农田灌溉视为“急务”,而对碾硞之利则持贬斥态度。

综观水力磨坊案中的相关言论,均将水力磨坊经营视为取利“末作”,无一不在传达“农本”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政治表达与圣君、良吏的形象建构形成内在呼应,“水力磨坊案”中的人物形象亦因是否尊重和维护这一合法性而变得泾渭分明。因此,“水力磨坊案”作为实现这一表达的素材或者说途径,其历史书写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如果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水力磨坊案”的历史书写语境和政治表达逻辑,遵从史家的褒贬之笔去解读历史信息,可能便会罔视史书记载与真实事件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并非因记载阙漏,而是书写者本身在记载时预设了是非对错的判断,也即水力磨坊本身是秩序的破坏者,而圣君、良吏则是正义的主持者。所以,通过此类文字表象所呈现的水力磨坊案,并非一定有故意歪曲的地方,但却需要抹去预设的情感、价值判断立场,析出事件的历史情境,才能透视其历史细节和史实,从而对事件本身的意义及其推理价值有一个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因此,基于上述认识,如果从研究路径来检视前人的相关探索,西嶋定生、钱穆、吴晗等学人的论断皆是赋予“水力磨坊案”及其历史书写所宣扬政治文化正义性以太多的解读空间,而没有深究“水力磨坊案”前因后果的复杂性。看似维护水利秩序的果敢作为或许根本称不上一次成功且卓有成效的行动,由此推出“重农抑技”的论断并认为其代表了官方的技术工具政策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对北宋水力磨坊较之唐代更大规模的发展以及“水力磨坊案”由唐至宋因袭不绝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 二、从唐宋水资源立法看水力磨坊政策

唐代的律、令、格、式几乎都有关于水力碾硞的条文。《唐律疏议》记载了有关碾硞庸赁、贸易等事项犯罪的若干适用条款<sup>④</sup>。根据宋《天圣令·杂令》复原的唐令第17条称“诸取水溉田,皆从下始,先稻后陆,依次而用。其欲缘渠造碾硞,经州县申牒,检水还流入渠及公私无妨者,听之。即须修理渠堰者,先役用水之家。”第61条称“诸外任官人,不得于部内置庄园田宅,又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侵(请)占田宅,营造邸店、碾硞,与百姓争利。虽非亲属、宾客,但因官人形势请受造立者,悉在禁限。”<sup>⑤</sup>《唐六典》卷7“水部郎中”称“凡水有灌溉者,碾硞不得与争其利。自季夏及于仲春,皆闭斗门,有余乃得听用之。”<sup>⑥</sup>卷30“户曹司户参军”条称“凡官人不得于部内请射田地及造碾硞,与人争利。”<sup>⑦</sup>当然,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水

① [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70《帝王部·务农》,第747-748页。

② [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第二》,第5647页。

③ [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58《帝王部·勤政》,第616页。

④ 分见《唐律疏议》卷4、11、12、15、20等,参[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

⑤ 兹据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杂令〉研究》,《文史》2006年第3辑。

⑥ [唐]李林甫,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226页。

⑦ [唐]李林甫:《唐六典》,第749页。



资源立法莫过于《水部式》，兹择其中与水力磨坊相关的规定录如下：<sup>①</sup>

①其蓝田以东，先有水碓者，仰碓主作节水斗门，使通水过。

②从中桥以下洛水内及城外在侧，不得造浮碓及捺堰。……诸水碾碓，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碓即令毁破。

③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碓，其水以下即弃者，每年八月卅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自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用碓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碓石，先尽百姓溉灌。若天雨水足，不须浇田，任听动用。其傍渠，疑有偷水之碓，亦准此断塞。

综合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唐代官方设计与水力磨坊相关之水利秩序的三个原则：

其一，在水利秩序设计中，用水之家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即享有用水权利的同时，亦有义务配合官方维护水渠等水利设施。例如《水部式》称官方“仰碓主作节水斗门，使通水过”，再如《天圣令·杂令》复原唐令第17条称，“即须修理渠堰者，先役用水之家。”又元和六年五月，“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浚渠功，并造斗门。及买渠地价，请官中与碓户分出。”<sup>②</sup>由此可见，碓户较之一般农户承担了更多义务，而且与官方是合作性质而非强迫，其经营合法性毋庸置疑。

其二，修造水力碾碓存在一定限制。例如法律规定在较为特殊的河道禁止修造水力磨坊，《水部式》称“从中桥以下洛水内及城外，在侧不得造浮碓及捺堰。”再如身份限制，如《天圣令·杂令》复原唐令第61条以及《唐六典》“户曹司户参军”条禁止部分官人营造碾碓与人争利。再如时间限制，《水部式》称“每年八月卅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若天雨水足，不须浇田，任听动用。”即部分碾碓用水需依农时而定。

其三，限制并非抹杀水力碾碓修造和存在的合法性。如《水部式》称“诸水碾碓，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碓即令毁破。”也就是说，于水利有害之碾碓要毁破，反之是允许正常经营的。《册府元龟》记称碾碓“正渠无害，支渠有损。乃命府县，凡支渠碓，一切罢之。”<sup>③</sup>所谓“正渠无害”、仅罢支渠正是这一规定的实际写照。又如《天圣令·杂令》复原唐令第17条规定的，如欲兴置碾碓，只要满足申报州县、弃水还流、公私无妨三个条件，即可合法设置。关于上述用水时间限制的问题，实则有两个限定的前提条件：其一，碾碓处于灌溉小渠；其二，“其水以下即弃者”，因为这种碾碓用水之后，水流不能复归渠道，严重浪费了水资源，故而才有限制，反之不弃的话未必就限制。

与唐代相比，北宋缺少类似《水部式》、适用地域范围较为广泛的水资源立法，但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有相关诏令的颁布，例如神宗熙宁六年（1073）五月戊申，“分命辅臣祈雨。诏创水碓、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官司容纵亦如之。”<sup>④</sup>所谓“违制”的前提是于农田灌溉有妨，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水力碾碓都不合规制。除此之外，宋代还有地域特征明显的有关水力磨坊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颇具代表性。

千仓渠位于北宋京西北路孟州济源县，乃唐节度使温造壅遏济水所建，至北宋时已因年久失修而遭废弃不用，其水源——济水则多被用来灌城濠池沼、种植蒲莲，以及供大姓豪民经营水碓之用。宋人吴充于嘉祐八年（1063）募民兴复千仓渠，得水稻种植之利甚溥，但是不出两年，即有豪民盗泄决水。治平二年（1065），州官差人下县点检，然差官不但不究盗水之弊，反于济水作堰分减水势，以致千仓渠水量受到严重影响，所惠之田亩亦渐成废壤。《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其初衷是希望通过立定

① 兹据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所引三条材料分别见于第578页，第579页，第581页。

② [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第二》，第5648页。

③ [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第二》，第5647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神宗熙宁六年五月戊申”，第5950页。

科条,明确水磨户的用水权利及其相应义务,使“民上下均停浸灌,以息争讼,务令经久,不为豪有力者规铜其利”<sup>①</sup>,易言之,即构建一个均平、无讼的用水秩序。其中与水磨紧密相关的是第四、五两条。

条四。龙潭水,自来济水,入千仓渠,不得引入别河兴置水磨等分减水势,如依旧却还千仓渠者即许使用。

条五。于济水上源旧石阔处置闸一座,每年正月十五日已后开闸,水尽入千仓渠,至九月一日已后闭闸,水尽入济河,许水磨户使用。如遇闭闸时月,非汛水长,亦许开闸减放。如遇闰月,节气早晚不定,至九月稻田未熟,尚要水浇灌,须候不用水亦许开闸。如遇闸有损坏,并系水磨户划时修整,不得有误稻田使用。每遇开闸,并须申县,取稻田人户状,实不用水,委官监视,方得开闸,仍候向去人户修筑堤塘,可以将无用水收蓄,增置稻田,亦更不开闸充动磨使用。

条四称引水兴置水磨“如依旧却还千仓渠者即许使用”,该条与《水部式》规定的“其水以下即弃者”非常相似。因为水磨用水与农田灌溉不同,灌溉用水要消耗水量,而水磨用水是利用水流产生的水力,如果设计得当,水流冲击水轮之后仍能复归故道的话,水量的损失是有限的。因此,条四规定水磨户使用龙潭水后,如能使其复归千仓渠,即可合法经营使用。条五则是水磨户用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最好说明。首先,科条尽可能保障水磨户的用水权利,即每年九月一日闭闸后,济水尽入济河,供水磨户使用,又提倡民户修筑堤塘蓄水,既可增置稻田,亦可充动磨使用;其次,水磨户需承担修整坏闸的义务。这些条文的规定与唐代的相关法规的精神和设计都颇为相像,由此亦可窥视唐代法律法规对宋代的影响。而这一点在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其载“农桑门·农田水利·河渠令”与《水部式》的相关条目颇为一致,其称“诸大渠灌溉,皆置斗门,不得当渠造堰。如地高水下,听于上流为斗门引取,申所属检视置之。其傍支俱地高水下,须暂堰而灌溉者,听。诸小渠灌溉上有碾碓,即为弃水者,九月一日至十二月终方许用水。八月以前,其水有余不妨灌溉者,不用此令。”<sup>②</sup>

法律乃统治阶层执政理念的反映,从《水部式》到《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法律条文旨在构建一个相对均平的用水秩序,水力磨坊在遵循一定限制条件和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下,与水利活动一样,拥有合理合法的用水权利,这是该时期水磨、碾、碓等水力机械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法律环境,亦即政策环境。尽管这些法律或者政策的实际约束力在相当时期内都受到了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一如八次典型“水力磨坊案”的发生,但是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侧面,即水利秩序的常态与非常态,而非非常态的特殊性显然不能笼统地作为代表进而推出一般性的结论,即不能由“水力磨坊案”的发生简单得出“重农抑技”或者说“重本抑末”的结论。

### 三、“重本抑末”论的表达与实践

唐宋“水力磨坊案”的发生和历史书写过程展现了中国古代“农”“技”观念表达与实践的不同历史侧面。流于政治文化层面的观念表达是“重农抑技”,反映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不可避免地带有“重农抑技”的色彩,但一并认可了“农”“技”的合法、合理性,拆毁行动也即“水力磨坊案”的发生则是具体落实到政治行为层面的实践。三者是紧密联系的一体,亦可能在历史解释中被肢解为三个不同侧面,而分别以其为基础所导向的历史面相呈现则可能大相径庭。

具体来讲,其一,水力磨坊经营与农田灌溉等传统水利秩序的矛盾并非必然,如果引水渠规划得当,产生水力之后的水流可以通过回水渠道复归干流,但是公平公正地营造水利秩序并非易事,历朝历代均

<sup>①</sup> 乾隆《济源县志》卷6《水利·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下引科条均同此。

<sup>②</sup> 杨一凡、田涛主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49《农桑门·农田水利·河渠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4页。



是如此,所以不论是磨坊主群体的违法、法律的失范还是官方的不作为,都成为水力磨坊与农田灌溉发生矛盾并激化为突出区域现象的合力因素,这亦是“农”“技”关系矛盾的一面;其二,从唐至宋,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水力磨坊的规模明显快速扩大,而非在不利法律环境的摧抑下、宋已不如唐代之盛,这既是先进技术的正常发展周期,亦是“农”“技”矛盾关系张力的体现。这种张力既体现在制度政策层面的设计原则,即充分承认水力磨坊合理合法的地位,又表现在官方政治文化、制度政策和行为实践层面的背离,即“农”“技”观念的表达与实践往往并不一致。二者关系的矛盾与张力亦是历史面相本身复杂性的体现,而对这种复杂性的把握是认识唐宋水力磨坊政策的重要依据,只从矛盾关系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是危险而不够审慎的。

颇有意思的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关章节的论述中亦注意到了唐代水力磨坊与灌溉水运的矛盾,他悉数《唐六典》《水部式》等相关规定,继而称“在这期间,有些官员成为磨坊主(“硃家”)的迫害者而闻名——例如李元纁在721年控告富户的水磨(“碾硃”)妨碍了灌溉,得到官方同意予以拆除。764年,李栖筠像堂吉珂德一样放肆,要求把不下于70个这样的装置(不仅有属于大家族的,而且有属于佛教寺院的)都拆除,结果就这样办了。但是最大的一次破坏磨坊的行动发生在778年,当时有80家磨坊被拆毁,连打败安禄山的救国功臣郭子仪将军的两台水轮也未能幸免。从我们得到的关于这些行动的资料来看,这些磨坊一般属皇妃和有权势的宦官或佛教寺院和富商所有。所有儒家官僚的反对,只是持久对抗的一个方面而已。”<sup>①</sup>然而,在同页的注释中,李约瑟又称“虽然对‘贵族水磨’征收研磨税成为欧洲封建法律和争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中国封建官僚更关心的是保持水路畅通,不致影响灌溉和粮税运输。这种官方对磨坊的限制,作为一种抑制中国中古时代工程发展的社会因素,影响有多大,还有待研究。”由此可见,在“同情”作为先进技术代表——水磨的立场上,李约瑟与钱穆、吴晗等学者较为一致,但是作为科技史家,李约瑟对宋代以降中国水磨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规模又有着清晰的认识,是故没有对所谓的“抑制”因素轻易作出结论。

“水力磨坊案”所蕴含的“农”“技”关系从属于古代社会“本末”范畴。不论是古代的政论语境,还是今人的学术表达,“重本抑末”是一个颇具普遍性的认识。但是,当我们以具体案例介入并检讨其表达和实践时,就会发现两者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情境中去认识和解释。张家炎在探讨“重本抑末”论的双重悖反特性时曾颇有见地地指出,“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表里完全不一的现象,即政策法令与实际情况的严重分离,具体说就是统治阶级一方面在政策法令上重视农业、轻视或抑制工商业,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却又倚重工商业者尤其是大商人而轻视农民。”<sup>②</sup>唐宋“水力磨坊案”的重申、发覆或可为这一论断提供一个典型的经验性注脚。其实不独是水力磨坊问题,在诸多关涉农技、农商等层面的问题探讨均有类似现象,尤其反映在若干宏观论旨层面的先验性描述。当然,历史上所谓的“重本抑末”可能从来就不是一个互相绝对排斥的问题,而是一种选择上的相对关系,一如唐宋水资源立法所展现的“本”“末”之间的优先性问题。

因此,重申唐宋“水力磨坊案”中文本书写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意在呈现“本”“末”关系的复杂性,而前辈学者“重本抑末”判断中的合理问题观照亦应予以充分尊重,不能全然否定。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相关主题研究的个案经验增多,也将逐步推动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本”“末”问题的丰富特质。

[致谢:外审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3页。

② 张家炎:《试论“重本抑末”的双重悖反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